

高教前沿

2016年第6期

(总第17期)

南京邮电大学高教所主办

2016年12月31日

目 录

◎ 高教动态 ◎

山东大学出台学科建设专项改革方案·····	1
西安交大成立本科生院、钱学森学院、创新创业学院·····	2
2016年中国高等教育十大事件盘点·····	3

◎ 高教视点 ◎

大学评教：让学生发出真实的声音·····	6
高校教师考核评价制度改革渐进：淡化“学术GDP”，多元评价育人才·····	7
大学管理，何处是归程·····	9
对话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培养什么样的人办什么样的大学·····	11

◎ 海外检视 ◎

大学创新的“特制酱汁”是什么？·····	15
日本启动国立大学分类改革·····	17
“工科教育计划”能否提升韩国高等教育·····	19
美国：“微硕士”项目呈发展趋势·····	20



◎ 高教动态 ◎

山东大学出台学科建设专项改革方案

近日，为落实《山东大学综合改革方案》要求，破除学科发展障碍，激发释放学科活力，加快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山东大学印发《山东大学学科建设专项改革方案》（山大学〔2016〕40号）（以下简称《方案》）。

《方案》系统梳理了山东大学学科建设面临的机遇和挑战，确立了“统筹布局，一体发展”“分层规划，差异建设”“学科引领，资源统筹”“三‘位’一体，特色发展”“拓展资源，开放办学”的改革思路，明确了推进学科现代化、国际化、融合化，以及到2020年前后5个左右学科进入国际主流排名全球前百名、15个左右学科在教育部学科评估中进入前十名、4个左右学科进入ESI前1%、8个左右学科进入ESI前2%等改革发展目标，提出了一系列重点改革发展任务。

实施“学科高峰计划”，打造一流高峰学科。《方案》提出了“学科高峰计划”的首批重点学科建设任务：重点建设中国语言文学、数学、材料科学与工程等3个优势学科，冲击世界一流水平；重点发展考古与历史学科等16个特色学科，打造国内一流的学术高地；重点扶持精准肿瘤学等4个新兴、交叉学科，培育新的学科增长点。

凝练学科方向，调整学科结构。《方案》提出按照“升位、错位、占位”的要求和“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凝练学科方向，突出发展重点，推动学科升级和学科现代化，有效解决学科老化和碎片化问题。统筹推进“学科整合计划”“本科专业现代化工程”和“研究生学位点动态调整计划”，构建起结构合理、特色鲜明、优势突出、融合发展的学科体系。

发挥学科综合优势，推动学科交融发展。为了推动交叉学科和新兴学科发展，《方案》提出了建立实体性或非实体性的跨学院研究机构，实施交叉学科研究项目，出台有利于交叉学科发展的倾斜和激励政策，以及搭建不同学科间的学术交流平台等有利于新兴交叉学科发展的重要举措。

凝练三地办学特色，优化学科空间布局。《方案》提出要按照“统筹布局，一体发展”的方针，进一步凝练济南、青岛、威海三地办学特色，完善青岛校区的学科布局，推进济南各校区和威海校区的学科调整，优化空间资源配置，促进学科加快发展。

推进学科机制改革，激发学科活力。《方案》提出启动学部制改革，完善学校—学部两级管理体制，推动管理重心下移；强化学科平台与基地建设，推进科研组织机制改革，建立竞争、开放、流动的科研组织体系；实施学科评价评估机制与学科建设绩效考核机制改革，以考核评估结果引领学科资源配置，并将考核评估结果纳入教学科研单位及其负责人考核体系。

改革经费管理机制，优化学科资源配置。《方案》提出改革“双一流”规划建设机制，围绕学校重点建设学科，统筹布局队伍、平台、科研、人才培养和国际交流等建设内容，集中配置办学资源，实现多位一体的重点建设；统筹“双一流”专项经费、基本科研业务费、各人才专项经费、重点平台专项经费、教育教学改革专项经费等与学科建设有关的各专项经费组成学科建设经费，主要



分为“学校统筹人才经费”“学校统筹公共支撑条件建设”与“学科自主专项经费”三部分，按照这三大用向对学科进行投入和支持。

此外，《方案》还提出了人事分配制度改革、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实施学科国际化发展战略等一系列支撑学科建设、对接其他专项改革方案的改革任务。

(来源：山东大学新闻网 2016年11月29日)

建立“通识教育+宽口径专业教育”模式

西安交大成立本科生院、钱学森学院、创新创业学院

12月24日，西安交通大学迈出人才培养体系综合改革的重要一步：正式成立本科生院、钱学森学院、创新创业学院。这3个学院的成立，旨在贯通本科生招生培养全过程、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路径、构建创新创业教育生态体系，全面提升本科教育教学的核心竞争力。

“培养模式难以适应时代发展、缺乏挑战权威的勇气、‘单声道’的课堂教学方式，都是当今中国大学教育面临的主要问题。”西安交大副校长郑庆华认为，“应试教育”导向明显、课程体系过于僵化、“重科研轻教学”的价值评价体系，以及教书育人被割裂、管理碎片化，无一不对本科生的教育教学质量产生重大影响。

记者了解到，新成立的本科生院，将作为西安交大本科教育教学的核心机构，通过对本科生培养管理和服务机构的“重组优化”，彻底打通行政系统和学生工作系统，同时建立健全“校、院、系”三级教学责任体系，夯实大学教育的基层“教学细胞”，以解决多部门分散管理的碎片化、信息不对称问题，激发办学活力。

“本科生院并非简单的组织机构调整。”西安交大校长王树国介绍说，本科生院正着力推进4项重大改革：首先，按照一级学科建系原则，将原有的150多个系整合成55个系，其中13个为院系合一。同时，赋予这55个系在人、财、物等资源配置，以及职称评聘、绩效考核、学位评审等方面的基本权利，使其成为破解基层组织“空心化”的突破口，激发基层“教学细胞”的活力。

其次，实施大类招生改革，建立“通识教育+宽口径专业教育”人才培养新模式。全校现有的83个本科专业，按照“7个大类+7个试验班”设置为14个招生专业，开展高考招生。

本科生的培养，分为3个阶段：基础通识教育（1年~1.5年），按大类培养，学生不分专业，主要学习通识教育课程及科学、人文、医学类基础课程；宽口径专业教育（1.5年~2年），学生分流进入学院，主要学习学科平台和专业核心课程；个性化模块学习及毕业设计（1年），学生根据培养去向，即攻读研究生、就业或自主创业，选择课程模块。

其间，学校将参照20:1的生师比例，从各院系和科研院所选聘优秀教师担任学业导师；基础课程实行“教考分离”，第三方评价。同时，学生还将在这个过程中学会“自主选择”，在选择中



成长——允许学生和院系双向自主选择对口专业；从基础课开始，逐步放开学生自主选择教师。

除此之外，“学院——书院”双院协同育人改革，也将发挥书院育人的独特优势；教育教学考评和教学绩效改革中，选课人数、“课堂抬头率”等指标，也将成为课程教学效果综合评价的重要内容，实现优劳优酬。

除了本科生院，西安交大此次还成立了钱学森学院，以中国航天事业奠基人、“西安交大最受崇敬校友”钱学森命名。作为西安交大教学改革的“特区”，钱学森学院将运用钱学森教育思想，以各门类试验班、少年班、校企合作菁英班为架构，为品学兼优的学生创造不设“天花板”的成长空间，试破“钱学森之问”。

创新创业学院则将积极融入“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国家战略，探索构建“一个目标、两个原则、三大任务、四项举措”的“一二三四”创新创业教育生态体系，为西安交大开展创新创业教育提供全方位支持，全面提升交大学生的创新精神、创业意识和创新创业能力。

这3个学院成立前，一整套全方位、体系化的人才培养体系综合改革已在西安交大展开，此次又将这一改革推向深入。“通过这一系列举措，西安交大将着力构建‘起点高、基础厚、要求严、重实践、强创新’的教育体系，力求培养在各行业起到引领作用的优秀人才。”郑庆华表示。

（作者：孙海华 来源：《中国青年报》，2016年12月25日）

2016年中国高等教育十大事件盘点

1. 全国高校思政会议，全面提升育人水平

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12月7日至8日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关系高校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以及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全过程，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努力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

2. 高等教育四个回归，双一流建设积极推进

教育部10月15日召开武汉高等学校工作座谈会。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陈宝生强调，在双一流建设进程中，高校要进一步转变理念，做到四个“回归”。一是回归常识。教育的常识就是读书。二是回归本分。教育的基本功能就是教书育人。三是回归初心。教育工作者的初心就是培养人才，一要成人，二要成才。四是回归梦想。教育梦就是报国梦、强国梦，具体体现就是“双一流”建设。

3. 教育质量“国家报告”，高教实现跨越发展

教育部发布《中国高等教育质量报告》，这是我国首次发布高等教育质量报告，同时，也是世



界上首次发布高等教育质量的“国家报告”。《报告》显示，中国高等教育飞速发展，对中国经济社会历史性变化起到人才和智力的决定性支撑。新世纪以来，中国高等教育实现跨越式发展，2015年在校生规模达3700万人，位居世界第一；各类高校2852所，位居世界第二；毛入学率40%，高于全球平均水平。

4. 加入《华盛顿协议》，工程教育走向世界

在吉隆坡召开的国际工程联盟大会上，中国成为国际本科工程学位互认协议《华盛顿协议》的正式会员。“这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个里程碑，意味着英、美等发达国家认可了我国工程教育质量。”从2005年起，中国开始建设工程教育认证体系，逐步在工程专业开展认证工作，经过近10年的发展，截至2015年底，已有553个专业点通过认证。

5. 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教育部下发了《关于中央部门所属高校深化教育教学改革的指导意见》。高等学校不断推进教育教学改革，人才培养质量大幅提高，创造了许多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在全国高校具有引领和示范作用。但一些高校仍存在教育教学理念相对滞后、机制不够完善、内容方法陈旧单一、实践教学比较薄弱等问题。为继续推动和支持高校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在“十三五”期间实施中央高校教育教学改革专项。

6. 学位授权动态调整，优化学科专业结构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关于下达2016年动态调整撤销和增列的学位授权点名单的通知。

7. “一带一路”行动计划，推进高教国际合作

教育部与福建、广西、云南、新疆六省(区)在京签署“一带一路”教育行动国际合作备忘录。“一带一路”是中国教育国际合作交流的顶层设计，是中国教育逐步走向世界教育中心的路线图，是在更高层次、更大范围推进教育国际合作交流的重要抓手。在“一带一路”总体战略下开展教育国际合作交流，积极主动服务国家对外开放大局。要做好统筹规划，通过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教育合作交流，为我国建设教育强国、实现教育现代化夯实基础。

8. 高校科研管理新政，促进创新驱动发展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完善中央财政科研项目资金管理等政策的若干意见》，《意见》聚焦高校、科研院所和科研人员关心的突出问题，遵循“四个坚持”的原则，着力激发创新创造活力：一是坚持以人为本；二是坚持遵循规律；三是坚持“放管服”结合；四是坚持政策落实落地。增强科研人员改革的成就感和获得感。

9. 对学生核心素养出台，高校教学如何应对

《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研究成果在京发布。核心素养以培养“全面发展的人”为核心，分



为文化基础、自主发展、社会参与 3 个方面，综合表现为人文底蕴、科学精神、学会学习、健康生活、责任担当、实践创新六大素养，具体细化为国家认同等 18 个基本要点。该成果是教育部委托北京师范大学，联合国内高校近百位专家成立课题组，历时 3 年完成的。中国学生核心素养的出台，对高校教师提出了新的挑战。

10. 高考招生指标调整，再次触及教育公平

教育部、国家发改委公布 2016 年跨省生源计划调控方案，高等教育资源丰富的 12 个省（市），将向中西部 10 个省区调剂共 16 万生源计划。其中湖北、江苏两省将分别减少 4 万和 3.8 万生源计划。此规定引发考生家长的强烈反应。5 月 15 日，教育部正式回应江苏、湖北 2016 年高考招生计划问题，安排协作计划，以不降低各支援省份的高考录取率、本科录取率为基本前提，落实“缩小区域发展差距，促进教育公平”的决策部署。

（作者：贺祖斌 来源：搜狐教育，2016 年 12 月 27 日）



◎ 高教视点 ◎

老师不为难我，我也不为难老师

大学评教：让学生发出真实的声音

“老师不为难我，我也不为难老师”，这样的表述反映了高校学生评教过程中师生微妙的博弈。临近期末，一般在期末考试之前，各大高校又将启动学生对教师的评教。从早先手写分数、机读卡到如今的网上评分，学生评教程序越来越便利，标准越来越规范。但是，起源于上世纪20年代美国高校的学生评教制度能否真实地反映教师的教学水平、能否全面体现学生意志，一直存有争议，其公允性和科学性也备受质疑。

年关岁末，又到了总结绩效、反思不足的时刻。在以人才培养作为根本目标的大学，这种总结与反思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对教师一个学期的教学效果进行评价。学生评教制度是这个评价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的学生评教制度源自美国。美国高等教育的突出特点，是注重服务社会需求、倾听受教育者声音、嵌入高度发达的市场文化。对于大学与市场、大学与社会的这种紧密互动，身处其中的学者们向无定论。上世纪初，制度经济学家凡勃伦专门写了本《学与商的博弈》，抨击商业利益侵蚀象牙塔、商业运作理念渗入大学的制度建构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然而，若要把评教制度归结为一种“消费者主权”或“顾客至上”的市场评价机制，又未免失之偏狭。它有着更悠久的历史传统文化传统。现代大学发端于中世纪，而中世纪的大学本身是一种行会组织。以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为代表的“学生主导型”大学是最早的模式，学生组成行会，制定教学管理规范，并聘请教师，教师是被雇佣者。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大学的办学经费不再紧张，大学教师作为管理者的地位凸显，以巴黎大学为代表的“教师主导型”大学成为主流。但教学自由与学生自治的传统都沿袭至今，学生评教制度就可视为两者互动形成的固定机制。

中国的大学引入学生评教制度始于上世纪末，至今已有20年左右的实践历史。从一个教师的角度，我认为这项制度至少有两点作用和意义：

第一，学生评教是检验教师教学效果的直观标尺。大学不是知识生产的工厂车间，教学过程不是《摩登时代》中的机械搬运，因而教学效果无法立竿见影。学生考试成绩的优劣也很难直接归功或归罪于教师。在这种情况下，教师要了解自身教学设计有无疏漏、教学重点是否厘清、教学过程是否连贯，单凭“自我感觉”是没用的，必须要赋予学生一定的评价权限，创设一种评价的“场域”并听取学生的意见和建议。大学评教系统一般由一系列复杂程度不一的量表组成，涵盖教学态度、教学方法、教学手段等多个指标，最终呈现为量化图表，供教学管理部门和教师自身参考。

第二，学生评教是师生互动的一种特殊形式。在当下的大学课堂教学中，一名教师面对几十上百名学生的状况很普遍。在这种情况下，不要说实现广泛深入的师生互动，就是师生之间混个脸熟都不太容易。而教学评价系统一般都有开放性的书面评价或留言的功能，学生可以将自己对课程和



教师授课过程的想法和建议，提交到这一系统。由于学生是匿名评价的，因而可以在没有心理压力的情况下发出真实声音。

当然，我也认为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大学的学生评教制度应当在以下三方面加以完善——

其一、应当在时间安排上创造更加宽松、自由和非功利的评教氛围。笔者先后在两所高校任教，据我有限的了解，大部分高校的学生评教时间集中在期中考试至期末考试之间。这一时间安排的微妙性有二：

一是由于学生评教结束时考试尚未进行，因而学生可能会有一种隐秘的考虑，不敢对老师进行客观评价，避免老师以期末考试成绩为后续的制约手段。即便是在完全匿名、确保信息不泄露的情况下，学生与老师之间似乎也形成了这种基于“恐怖平衡”的“默契”。

二是评教与下学期选课同步启动，而很多学校将是否完成评教作为进入选课系统的门槛。这就带来一个问题，一些学生并非出于自愿和主动，仅是为了尽早选课（否则可能选不上）而不得不评教。可想而知，这种评价结果是仓促和不负责任的。回想起我自己这一届的不少同学十几年前在大学阶段的评教经历，就是按着键盘上的“Tab”键一路切换下来（自动延续上一个选项），目的只是为了快点完成评教，开始选课。因而，我以为，在评教时间的安排上，应当设计得更加合理，让学生少些顾忌，更加大胆直接地表达意见。

其二、应当建立尊重学科特点的，科学化、精细化的评价指标体系。学生在评教时，是将整个学期所上的课同时进行评价的。这就涉及不同课程之间能否以及如何进行横向比较的问题。关于这一点，我从不同的同事口中了解到的意见并不完全一致。毫无疑问，应当建立一种包容性的评价指标体系，既避免“关公战秦琼”的笑话，也避免所属院系的亲疏远近对学生评价造成扰动。

其三、应当向师生双方及时反馈教学评价结果并加以解释。教学评价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教学效果的提升和改进也永远在路上，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因而，教学管理部门不应只将其作为自身的常规性业务，借以应对各种检查评估，抑或只是将数据作为人事部门进行教师岗位聘任的一个必备条件；而要回归引入这一制度的初心，将之用好、用活，把评教结果和意见建议及时反馈给双方，并在一定范围内公开。这才可能形成一种制约机制，形成教、学、管之间的合力，实现大学治理的共治共赢。

（作者：曹东勃 来源：《中国青年报》，2016年11月20日）

高校教师考核评价制度改革渐进： 淡化“学术GDP”，多元评价育人才

如何用考核与评价更好地“用人”和“留人”？这是摆在各大高校面前的现实难题。5日，教育部深化高校教师考核评价制度改革经验交流与研讨会在南京举行，全国32个省市自治区的教育主管部门负责人和75所部属高校分管校长与会。



引才恶性竞争，用人留人均陷困境

“每次有教授评上长江学者，我们就紧张，不要又被盯上了。”“今天这个高校年薪100万元聘请，明天另一个学校开价一套北京的房，这位教授便立即奔开价更高的那家而去……”在当天的会场，不少校长提到，人才争夺已有陷入恶性竞争的隐忧。

有校长透露，很多地方高校在挖人时候打高价牌，高层次人才的价格都在年薪100万元以上，甚至200万元，有高校甚至耗巨资挖走同省高校一整个团队。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吴晓球对此感触很深，培养一个名教授要花很大精力，被其他高校用高薪挖走，几乎整个学科链都会受到重创。

“100万元年薪，一套房子，2000万元科研经费，这不是考验人性吗？”吴晓球质疑这种从物质层面的刺激，导致部分教授对功利的追求超过对学术的追求，而这可能并不利于学科的成长。“把人变得向物质看齐，向房子看齐，怎么培养对学科的兴趣和忠诚呢？”

近年来，不少高校组团出国摆摊设点，争抢海外高层次人才，同样出现恶性攀比的情况。一位校长透露，广州、深圳一些高校因高水平大学经费已经下发，开始大规模引进人才，开价令人咂舌。但不少校长认为“砸钱”不仅不可持续，也并不符合高水平大学的建设规律。“高水平大学需要长时间积累，不可能一蹴而就。引进人才必须根据自身的定位和发展目标，比如南方某师范大学耗巨资引进一个工科团队，这对该校的特色发展、一流学科建设，可想而知并没有什么效果。”

用良好机制激励人，促人才有序流动

南京大学副校长谈哲敏坦言，从国家层面讲，鼓励人才竞争，中国高校人才资源的整体流动不可阻挡，未来甚至是全球性的竞争。“只要有实力，哈佛大学到南京大学来挖人也是可能的，高校没办法把门关起来。”

东南大学副校长王保平认为，应提高校内人员待遇，让校内人才和校外引进人才在同一个评价机制下，用良好的激励机制让人脱颖而出。形成强大的人才资源，就不会再依赖从校外或国外“人才进口”。目前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校已打破内外差异化的薪资制度，做到引进人才和本土人才一套评价体系，激活全体教师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江苏省内高校比如南大、东大，很快也会实现“校内外一致”，只要达到考核相关要求，“家里人”也能拿高薪。

让高校安心培养自己的人才，还应该建立人才有序流动的规则。吴晓球笑言，有其他校长提出学者转校应该仿效球星转会制，给高校一定的培养补偿，“这虽然是笑话，但也说明人才有序流动对高校整体发展的重要性。”

王保平说，高校既要有自主权，但也要加强自律性，同一地区、同一层次的学校应该有相对平衡的薪资，当然靠政府下命令并不可取，必须依靠高校之间的学术组织。“比方说，美国大学校际之间也有人才竞争，但美国大学有联盟，他们每年都会坐下来探讨协商人才引进等问题，要达到内部的协调一致。不如建立类似学术联盟的机构，通过课程共享、资源互用的方式达到双赢。”

分类多元评价，淡化“学术GDP”

从各大高校负责人口中，记者听到一个高频词——分类考核。



浙江大学副校长张宏建说，教师岗位被分为教学、科研、科研教学、社会服务与推广岗等五类岗位，擅长从事科技成果转化的，将为其开通技术研发及知识转化研究系列的晋升通道。谈哲敏说，不同序列的教师都应有自己的晋升通道，南大每年也有教师因为教学好，而成为“教授”，当然每个序列的“含金量”是相同的，“每条路都不容易”。

而对于“千人计划”的高手，南京大学会采用学术公开述职的方法进行评价，业内同行、老师甚至学生都会参加。学者与大家交流这3年或6年来做了什么工作、有哪些成绩、未来的发展方向及改进思路。用一种探讨的方式进行过程性评价，而非“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谈哲敏说，凭借卓越的教学也能升教授，这就要求教师必须有“教学的学术”，上课课时量、广受学生欢迎还只是个基础门槛，必须对教学有独特的见解和深厚的积累，“教学成果奖”、有关教学的论文和专著都是相关的参考条件。他告诉记者，近两年南大已经有个别教师通过该通道获得晋升。

在职称和职员晋升过程中，高校普遍实行师德一票否决制。北京大学形成全面系统的教师师德管理制度系统，规定若干种违规处理的细则；南京大学对各级各类人才项目的候选人，首先进行校内预申报预评估，对思想素质等达不到学校要求的，坚决不予申报；武汉大学对学术不端和学术失范行为实现“零容忍”，并明确规定“实行学术道德问题一票否决制”；中山大学对教师职业操守进行年度考核和聘期考核，对严重违反学术道德，违反学术规范者予以解聘。

过去，在教师考核过程中，“数文章”“拼数字”普遍，而眼下，淡化“学术GDP”是共同的改革方向。吴晓球说，单纯量化考核对重要学术创新和探究难以起到激励作用，我们新的科研考核评价推行代表作评价，鼓励教师潜心治学，克服期刊“一刀切”的弊端，数量化评价部分让位于同行学者和定性评价。

武汉大学副校长冯友梅介绍，该校实行全过程的发展性评价，引导教师从事高水平和高质量的研究工作，通过教师业绩库等大数据整合，评价教师未来的发展潜力，帮他们找准职业发展方向；同时鼓励教师服务社会，认可教师在政府政策咨询、智库建设、新闻媒体及网络上发表引领性文章方面的贡献。中山大学对不同学科侧重不同的代表性成果，比如工科增加完成国家或行业的技术标准，医科注重国家新药证书等等，不仅认可科研论著，也认可决策研究、技术开发、工程应用、人才培养等成果方式，全面评价教师的成果质量。

（作者：杨频萍等 来源：《新华日报》，2016年12月6日）

大学管理，何处是归程

去年四月，我在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演讲，谈中国大学问题，其中有这么一段：“回过头来看这一百多年的中国现代大学史，有两处路走得比较顺畅，一是1928年—1937年；再就是1998年—2014年。其他的年份虽也有若干亮点，但往往是起伏不定。最近十六年的争创一流与大学扩招，二者高低搭配，各有各的道理。身在其中者，很容易发现诸多积弊，因而怨声载道；但若拉开距离，



其雄心勃勃与生气淋漓，还是很让人怀念的。”（《当代中国大学公平发展的步履与生机》，《探索与争鸣》2015年第5期）。最近这些年，我多次在公开演讲中谈及中国大学充满张力的“既乱七八糟，又生气淋漓”的有趣局面——国家投入剧增，科研项目林立，奖励繁多，人才辈出，但显得有些虚胖，管理上不尽如人意，以至于我有点担心，如此“万马奔腾”的局面到底能持续多长时间。

对于近二十年中国高等教育因投资剧增而办学条件迅速改善，我持充分肯定的态度。但这四大工程（“211”，“985”，2011计划，两个一流）中，我认为最有意义的是“211”。“211”工程最初的设想，是“为了面向21世纪，迎接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挑战”，中央及地方集中力量，重点建设100所左右的高等学校和重点学科，使其达到世界一流大学的水平。不要追问何为“世界一流”，反正在原有基础上“大有长进”就行了。“211”只是一个标志性的台阶，“若越来越多的中国大学踏上这个台阶，是大好事”（参见陈平原《拓展“211”工程，实现高等教育的均衡发展》，2015年3月27日《文汇报》）。因此，在我看来，最佳方策是落实当初的承诺，“成熟一批吸取一批”，兼顾公平与效率，用增量办法来解决大学之间的发展差距问题。抛弃仍有很大发展空间的“211”工程，对于那些就缺临门一脚的大学来说，固然是严重挫伤；更可惜的是，无法借此调整中国大学布局，推进教育的均衡发展。

依我之见，这四大工程中，“211”属于“雪中送炭”，其他三项均为“锦上添花”。改造并推进“211”工程，让更多经过多年苦心经营、已大有长进的大学入列，可扩展优质教育的资源。若一味“优中选优”，对于若干名牌大学来说，确实大有好处，但这种类似“奥运金牌战略”的发展思路，不利于中国大学整体水平的有效提升。回头看上世纪三十年代、六十年代、八十年代，中国各大学之间的差距并不像今天这么大；如此三六九等，若彻底凝固化，绝非好兆头。

我并没有说全国两千多所大学应该迈开腿齐步走，只是希望给那些有雄心、肯努力的大学提供上进的空间。从1995年公布第一批15所“211”大学，到2008年底第四批5所“211”大学新鲜出炉，短短十几年间，各大学都铆足了劲，在争创“211”的道路上快马加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可惜的是，闸门哐当一声落下，不少信心十足且准备充分的大学，从此被拦在了大门外。既然“211”已经成为很好的教育品牌与评价指标，为什么就只能局限在112所呢？“若我们不急不缓，有序推进，到2050年，建成150或180所“211”工程大学，有什么不妥？”（《我为何要“充大头”，为非“211”高校说话》，2015年4月3日《文汇报》）

我当然明白，随着2016年6月30日教育部官网宣布《关于补充高等教育“211”工程三期建设规划的通知》《关于继续实施“985”工程建设项目的意见》等失效，这持之以恒、改造并推进“211”工程建设的良好愿望彻底落空。大学中人，眼下都紧盯着“两个一流”这块“大蛋糕”，不再提“211”和“985”，连出台没几年的2011计划也都无人理睬了。因为，从目前显示的诸多迹象看，国家及各省市对“两个一流”的投入会很大。作为关注中国教育多年的老教师，欣喜之余，我还是有不少疑虑。

第一，以现在中国大学格局，再评一两次、三五次，获益的总是那些精英大学。有机会出席“豪宴”的，很可能就是原“985”大学，连“211”大学都不太够格，其他的就更只能“过屠门而大嚼”了。鼓励自由竞争，想象有一匹（甚至一批）“黑马”奔腾而出，凭借自家实力，从底层迅速跃起，那只能说是“神话”。我的基本判断是，马太效应将因此举而进一步加强。



第二，原本希望随着大学章程的制定，各大学获得办学自主性，自己把握自己的命运及发展方向，出现重大偏差时，方才需要教育主管部门出手（参见陈平原《如何兼及咨询与监督——从“章程”看大学与社会之关系》，2014年12月15日《经济观察报》）；现在看来，制度性创新的效果不明显，甚至很可能徒有虚名，还是回到运动式管理的老路。

第三，高等教育是个极为庞大的系统工程，牵一发而动全身。国家确定发展战略后，最好是根据时势适当微调，保持一定的连续性，若非万不得已，不要急转弯。过于频繁的政策调整，表面上看不断地上一个新台阶，获得一种新视野，实则欲速则不达。办教育须有长远规划与平常心，短期内各大学自由腾挪的空间并不大，“步步为营”比“大跃进”更值得嘉许。应鼓励各大学自我做主，发掘潜能，苦练内功，稳扎稳打，而不是寄希望于一系列的填表与评估，达成“跑部钱进”的目标。过多的管制与评审，必定造成眼睛向上的思维定势——即便领导全都出于公心，下面也会养成等候与迎合的心态。摆脱“一统就死，一放就乱”尴尬局面的最佳方案，便是“抓小放大”（或曰“抓弱放强”），让那些已通过多次评估、证明办学资质不错的大学，充分行使办学的自主权。

（作者：陈平原 来源：《光明日报》，2016年12月13日）

对话教育部部长陈宝生： 培养什么样的人办什么样的大学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教育的地位和作用不可忽视。我们对高等教育的需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对科学知识和卓越人才的渴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在教育界引起强烈反响。

面对“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为谁培养人”“办什么样的大学、怎样办好大学”这两个根本性问题，中国高等教育怎样作答？如何应对挑战与现实问题？一连串问题摆在了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陈宝生面前。他对中国高等教育的现状有着怎样的观察，对改革发展有着怎样的思考？近日，光明日报记者专访了陈宝生。

对高教发展现实，要多一些警醒、反思和忧患

记者：全国高校思政工作会议为我国高等教育指明了方向。你怎么看待当前高等教育的历史特征？

陈宝生：习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我们党对高等教育发展规律的新认识，全面回答了“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为谁培养人”“办什么样的大学、怎样办好大学”两个根本性问题，是一篇指引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的纲领性文献。今天的高等教育改革发展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把握这些特点才能进一步认清高等教育在党和国家事业全局中的地位作用、目标任务。



一是供求关系在变。高等教育大众化深入发展，很快就将进入普及化阶段，人民群众对优质高等教育的需求越来越大，对多样化、个性化高等教育的呼声越来越高。二是外部需求在变。新的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方兴未艾、频率加快，国家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高校必须在人才和智力支撑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三是国际竞争环境在变。我们已经从“仰视”国外高水平大学逐步转化为一种平等交流、合作竞争的新关系。有的高校已经从跟跑进入并跑阶段，并在某些领域具备了领跑的态势。我们的舞台是国际舞台、坐标是国际坐标、标准是世界标准，这给我们带来了历史性挑战。四是教育对象在变。我们面对的是世界上最大的独生子女群和最大的网民群体，他们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学习方式、交往方式与以往大学生相比有了很大变化。我们熟悉的教育理念、管理方式、人才培养机制、培养模式、教学内容和方法，都迫切需要作出改革和调整。五是资源条件在变。2012年以来，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GDP占比稳定在4%以上，今天教育可以调动的资源，是历史上从没有过的。

记者：“培养人”和“办大学”这两个关键问题，需要具体转化为办学理念。

陈宝生：要回答好这两个根本性问题，我们要结合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多一些警醒、反思和忧患，进一步明确和完善发展理念。对此，我有五点体会。

一是教学决定生存。学校为教学而建，离开教学，校长不是校长、教授不是教授、大学不是大学。二是科研决定水平。教学出题目，科研出文章，成果进课堂、上战场。很大程度上，教学的水平、服务的水平、国际的影响基础在科研。科研水平上去后，还要开展两项服务：科研成果进课堂，服务于教学和育人；大力推进科研成果转化，服务于国计民生，形成良性循环。三是服务决定地位。要让政府重视教育、社会尊重教育，首先要做出事来、做出成绩来。四是质量决定兴衰。有质量才有核心竞争力，才能吸引一流的教师、学生、留学生和社会资源。五是制度决定成败。制度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大学制度，其中最根本的就是党对高校的领导。在这个框架下，要进一步建立和完善现代大学制度和校内具体规则，提高办学效率。

立德树人，要落实到提高教育质量上

记者：“高校立身之本在于立德树人”，但我们观察到，在实际工作中，一些地方和高校对此多少有些停于口号、止于宣传。

陈宝生：我们说教育要回归常识、回归本分、回归初心、回归梦想，归根结底，就是要坚持立德树人这一根本任务。

立德树人要落实到学生健康成长上。要认真研究教育对象特点。这一代大学生数量越来越多，人生目标更加多样，价值观更加多元，接受新思想新知识的渠道更加多面，大学生生活更加多姿多彩。面对这样的大学生，我们要更加重视因材施教，真诚突出学生主体地位，着眼于学生的健康成长，改进教育教学方法，发展每一名学生的优势和潜能。要强化教育教学与现代信息技术的深度融合，推进教育教学方式变革，提高教育教学实效。

立德树人要落实到教师教书育人上。教书育人是教师的第一要务。目前大学教师队伍总体是好的，但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有些年轻教师、海归教师对国情的了解不是那么深入；有些教师缺少相关教学能力的专门训练；有些教师重科研轻教学，有的教授只挂帅不出征、由助手代为讲课；也



有个别教师师德有亏，做出超越底线的事情。为此，要大力加强师德建设，通过改进评价体系，强化激励措施，奖惩并举、奖优罚劣，引导和激励教师坚持教书和育人相统一、言传和身教相统一、潜心问道和关注社会相统一、学术自由和学术规范相统一。要重视提升教师教学能力，通过开展培训、加强交流观摩、充分发挥教研组作用、鼓励开展教学研究等方式，引导教师把主要精力用在教学上。

立德树人要落实在提高教育质量上。中国高等教育已经进入到提高质量、促进公平、优化结构、改善环境的新阶段。抓质量，就要抓责任、抓标准、抓激励、抓评估。我们要给高校充分的自主权，高校也要强化质量意识，肩负起抓质量的责任。质量是有标准的，没有标准就没有质量，教育部将出台专业质量标准，高校要基于标准甚至高于标准培养人才。标准是底线要求，高于标准才是先进水平。

记者：高校如何才能承担服务国家这一使命？

陈宝生：从根本上来讲，我们不是为了办大学而办大学，而是要扎根中国大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在服务中体现价值追求。

这些年来，高校为国家培养了一亿七千多万名受过高等教育的各种人才，他们中间的优秀代表已经创立出了许多举世瞩目的标志性成果，像“两弹一星”、载人航天、高速铁路等。

当然，我们也注意到，有些高校的同志还安于闭门办学，缺乏服务国家、服务社会的主动性，对大规律不理解，对大逻辑不清楚，对大趋势不敏感。要知道，把握住社会需求，服务好国家需要，高校发展才有目标、有动力。而增强服务国家的意识，关键是要主动与国家战略对接。国家战略是导向，高校的同志们要认真学习国家大的战略、规划、部署，结合学校实际和社会需求明确学校的定位，谋划学校的发展。比如，国家“十三五”规划我们对接的怎么样？全国科技创新大会、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等重要会议，我们是否领会了其中对高等教育提出的要求？再比如“一带一路”，高校就要去研究，国家战略的要旨是什么，相关国家有什么特点和需求，我们在语言培训、课题攻关、相关类型人才培养等方面能发挥什么作用。这样我们才能把握机遇，发展自己，贡献国家。

没有高质量的本科，就建不成世界一流大学

记者：在对这两个问题的求解中，与“培养人”密切相关的思政工作至关重要。我们在调研中发现，在一些学校无论思政课老师怎么用心讲解，总有学生不感兴趣或刻意抵触。

陈宝生：高校要培养和造就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就要理直气壮地用马克思主义占领教育阵地，提高战斗力。

一是要教师、学生两条线并进。要根据不同教师的特点有针对性地开展思政工作。对于老教授、老专家，要充分发挥他们在承载、传承学校精神、校园文化中的积极作用；对于青年教师，要重点把握好入门关、培训关和考核关。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重点在于教化，就是以理服人、以情动人、以文化人。要结合他们初步具备了逻辑思维能力，但理论认知相对薄弱的特点，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培育正确立场、观点和方法。高校领导要亲自讲思政课，这才能体察一线教师的困惑和问题，摸清思想政治工作的规律，找到改进方法和途径。



二是要把握好课堂、教材和网络。要明确教师课堂教学的政治底线，建立健全课堂教学管理体系，确保课堂意识形态安全。教材体现国家意志，要从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高度抓好教材建设，把好进口教材关，切实加强教材建设的意识形态安全。网络是当代大学生重要的成长环境、学习工具和交往方式。有人讲，几堂思政课抵不上一个微信段子，碰到问题不问老师问“度娘”，遇到困难不在班组讲而在朋友圈求安慰，这给学校的管理，尤其是思想政治工作带来了重大挑战。我们要用正确、积极、健康的思想文化占领网络阵地，防止一些人利用网络传播错误的思想和信息。

记者：培养好人、办好大学，教学至关重要。但我们在采访中却听到不止一位老师的吐槽：现在“教学成了良心活，科研才是硬杠杠”。

陈宝生：教育者的本分是教学，要回归教学这个本分。提高教学水平，基础在本科。没有高质量的本科，就建不成世界一流大学。

近年来，本科教学工作开始升温，但仍有较大提升空间，在本科教学上一定要舍得用力、下足功夫。高校领导不抓教学，不是失职就是渎职，至少是不称职。要时常问问自己，听了多少课，接触了多少师生，研究了几次教学工作，对教学工作是否心中有数。提高教学水平，完善业绩评价和利益导向机制、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资源使用效率也很重要。这些年，国家拨了那么多钱，有多少钱是真正用在教学、人才培养上的？今年，国家专项支持中央高校搞教育教学改革，这笔钱是怎么用的，是否用出了成效？据我所知，这笔钱下拨后，高校更加注重课程内容建设、教师教学能力的提升和教学制度化建设，但也有个别高校领导对此不了解，工作不到位。

记者：再有就是大家都很关注的“双一流”。曾有大学校长无奈地说：进入“双一流”意味着得到重磅支持，大家都在疯狂“挖老千”（挖“千人计划”等专家）。这会不会引发无序竞争？学校该怎么对待“双一流”？

陈宝生：“双一流”是一个重点建设项目，要出人才、出成果，但更是改革项目，要考虑教育理念的转变，实现以投入换机制、以建设换模式。“双一流”建设也是一个效率计划，是冲一流的，这是国际上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个趋势。“双一流”的逻辑起点是“985工程”“211工程”，在布局时，前期要注重存量微调、增量优调，中后期要突出绩效考核、动态调整。先一步进入“双一流”建设的高校要有改革意识，确保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成果转化、内部管理等方面为其他高校探索经验，发挥示范带动作用；要有竞争意识，“双一流”身份不是固化的，要讲究建设效益。暂时没有进入的也不要气馁，动态管理就意味着机会。各学校要把精力集中在改革发展中，不应把精力放在追名逐利上。

（作者：田延辉、邓晖 来源：《光明日报》，2016年12月29日）



◎ 海外检视 ◎

大学创新的“特制酱汁”是什么？

康奈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正与以色列科学技术研究所（the Technion-Israel Institute of Technology）在其新的以技术为导向的康奈尔科技园区上进行合作，该园区位于纽约市。《高等教育纪事报》（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近期的一篇文章写道，康奈尔大学此举是为了利用以色列科学技术研究所的开创精神，而并非是该研究所中任何特别的组织创新，这与世界上许多顶尖的重视研究和创新的大学有着共通之处。

由于以色列科学技术研究所的教授们领导着纽约的康奈尔科技园区，所以该校更多关注培养“衍生人群”而非“衍生公司”。尽管以色列科学技术研究所在培养敢于创新的毕业生上取得了巨大成功——42%的毕业生创立了自己的公司，但是，这未必能在纽约实现。在院校文化中实现学术文化或是特定创新的转移并非易事。

麻省理工学院或是其他院校带来的经验教训？

麻省理工学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的案例或许能说明一些问题。无疑，麻省理工学院培育了一些世界上最优秀且最具创新精神的毕业生。而且，该校似乎有一种独特的文化，催生了创业精神和新的理念。麻省理工学院雇用了一些全球范围内天赋异禀且善于创新的教授，并努力确保他们适应大学的氛围。学校提供了这样一个环境，它推动把校内产生的知识转化为产品和创新并在“现实世界”中得到实际应用的过程。另外，大学为那些希望实施其想法的教师和学生提供支持。

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麻省理工学院应邀去帮助其他国家的大学发展“迷你麻省理工学院”（mini-MITs）——提供“特制酱汁”以将一所资源丰富的院校转化为创新及创业型的世界一流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已参与了一系列的合作项目，在某些情况下是帮助建立新的大学，另一些时候则是提供大量输入以发展现有的大学。在麻省理工学院帮助下建立的院校包括：莫斯科斯科尔科沃科技研究所（the Skolkovo Institute of Technology）、阿布扎比玛斯达尔学院（the Masdar Institute）、新加坡科技设计大学（the Singapore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nd Design）。另外，麻省理工学院葡萄牙项目援建了科技系统，剑桥—麻省理工学院研究所（the Cambridge-MIT Institute）与英国剑桥大学（Cambridge University）在各类项目上合作了数十年。

虽然这些项目的全面分析尚未公布，可以公平地说，所有项目都面临着挑战，还未有任何一个项目在获取“特制酱汁”（即麻省理工学院成功秘诀）中有任何实质进展。所有这些举措都得到了合作机构或是捐助者的慷慨解囊，因此麻省理工学院获得了可观的收入。这些都显示了把学术文化从一个机构转移到另一个机构的难度，而这在不同的国家环境中尤为复杂。

麻省理工学院与以色列科学技术研究所并非是康奈尔科技园区的仅有参照物。还可以看看其他关注产生创新的非常成功的大学模式。在孕育创业公司及培养为硅谷的信息技术和相关领域做不出



凡贡献的毕业生上，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取得了巨大成功。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ETH Zurich)在技术教育上取得的成就，以及它与工业和技术的联系及在此之上做出的贡献也广为人知。两者都与麻省理工学院差异巨大。虽然将卓越品质与产业贡献相结合起来的大学为数不多，但仍有许多不同的模式相当有用。

关键配方是不够的

搞清楚高质量研究型大学的主要需求并非难事。我们的著作《学术卓越之路：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的建设》(The Road to Academic Excellence: The Making of World-Class Research Universities, World Bank, 2011)提供了成功的新型大学的案例研究。所有大学在短时间内都在科研上有了实足进步，且大多数学校为其国家做出了贡献并在全球排名中取得了飞速进步。但是，在组织或是学术特征上，没有一所学校可被称作是具备独有原创性的。

创建一个新型研究型大学所需的关键因素包括以下几点，充足的财务资源以启动项目及维持长期的卓越；涵盖学者积极参与而非学者完全控制的治理模式；强有力的领导，不仅包括远见卓识的校长，也包括能够实现大学使命的专业行政人员；不受政府或私有部门干预的自主权，但要承担合理范围内的外部问责；在教学，科研和出版上的学术自由；致力于大学使命（包括教学）的顶尖学术人员，学校给予其丰厚酬劳并为其提供合理的职业阶梯；高素质且积极进取的学生；对各阶段英才教育的坚定承诺。

这些元素都没有提供“颠覆性创新”，即许多人认为的 21 世纪大学卓越所必须拥有的特点。所有元素都是近百年来成功大学可靠且真实的特征。没有哪所大学是完美的，但所有成功的研究型大学即便不包含所有的特征，也拥有它们中的大多数。这些都是大学卓越的“普遍原则”。

颠覆性创新

这里讨论的特性并不保证创业活力，或是动态的创业文化。以色列科学技术研究所或许会发现在输出其创业文化上，它与麻省理工学院面临同样的困难。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从一所大学向另一所大学传送一个高度复杂的学术文化是相当具有挑战性的。模仿，复制或适应他人的成功配方并不容易。创新高校产生于反映原创愿景独特的价值定位之中，并在把这一愿景变为现实的能力之中得以发展。这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得以实现：(1) 在新的多学科领域中的专有项目，(2) 互动、协作和体验式教学和学习方法，也许最重要的是，(3) 21 世纪的能力（主动性、团队合作、沟通）和积极的性格特征种类（好奇心、勇气、社会责任感）的独特结合，从而激励优秀的专业人才和成功的变革推动者。

位于马萨诸塞州的富兰克林瓦特欧林工程学院 (Franklin W. Olin College of Engineering) 可能是最佳案例之一，它可以说明设立一个新的、真正创新性的院校需要什么。欧林学院于 1999 年开始运行，它拥有一些大胆前卫的特质：提供试验性的实验室以改造美国的工程教育。欧林学院在运营中带有几个不同寻常的特点。它的课程以独特的方式将工程学、创业精神和人文学科相结合。欧林学院受益于欧林基金会大量的启动资源，并在创立之初提供免费教育。欧林学院招收了这样一批老师和学生，他们相信学校的创新使命并愿意投身于这所新建的院校之中。欧林学院的成功印证



了在调整其他地区现有成功模式的基础上建立“本土”模式的益处。

结语

也许，在高等教育中发展创新的通用“特制酱汁”并不存在；另外，“颠覆性创新”未必总是带来积极的改变——事实上，彻底变革可能会适得其反。最后，大学发展的真理终归是建立创新的最佳途径。但是，在外部技术的援助之下，以色列科学技术研究所的创新基因是否能在其他地方得到有效推广还需拭目以待。

(作者: Philip G. Altbach、Jamil Salmi 来源: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高等教育》电子版, 2016 年第 3 期)

日本启动国立大学分类改革

日本自 2004 年启动国立大学法人化改革，以六年为一个周期，2016 年开始进入第三个六年（2016 年至 2021 年）中期计划。在这个新的中期计划中，日本文部科学省以“世界卓越、特色优秀、地域贡献”三组类型划分，对 86 所国立大学的功能定位进行了重新规划。

国立大学分类的逐步探索：追求高校特色化、多样化之路

此次日本国立大学的功能分类改革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 10 余年的探索。

2005 年，日本中央教育审议会的《日本高等教育未来展望》报告就明确提出，未来大众化阶段的高等教育机构必须实现特色化与多样化。各个大学要根据自身的使命与功能，合理定位，明确特色。

报告指出，二战后日本高等教育迅速普及，从数量上看虽然实现了教育大众化，但并没有同时伴随教育质量的提升。而且，在日本 18 岁人口减少的趋势下，众多缺乏个性的高等教育机构都把目标放在单一的市场（即 18 岁至 21 岁的全日制在校学生）中进行竞争，整体效率非常欠缺。

面对社会结构和人才需求的多样化，报告提出了日本大学整体（包括国立、公立、私立）7 个功能分类的提案，即“世界的研究、教育中心；高度专业化人才培养；多方面职业技能人才培养；特定专门领域（艺术、体育等）的教育、研究；综合性的教养教育；地域终身学习的基地；社会贡献（地域贡献、国际交流等）”等。每所大学可以具有一种或多种功能，但各功能所占的比重应有所不同。正是各个大学功能比重分配的不同，体现出各个大学的个性和特色。

2013 年，文部科学省发布了《国立大学改革方案》。《方案》指出，日本现在面临新的社会经济形势——全球化日益加深、国内 18 岁人口逐年减少、产业竞争力衰退，各国立大学应最大限度发挥自身的强项和特色来应对新形势，在今后发展中重点瞄准三个方向：世界性教研据点负责世界尖端科研创新，全国性教研据点负责开展全国顶尖的科研活动和与世界接轨的特色教学活动，地域发展核心据点负责培养适应地方需求的人才，解决地方发展的课题。这三个层级的据点各司其职，分别负责应对全球化、特色化以及地方发展需求的多样化。这一方案的提出形成了国立大学功能分类



的雏形。

2015年6月,日本文部科学省面向全体国立大学发布通知,要求各国立大学“重新定义自身使命与职能”,在此基础上“全盘修正国立大学法人的运行机制”,进行组织改革。通知明确指出,“国立大学应积极发挥相应职责,特别围绕教师培养学科、人文社会学科等,制定相关改组计划,积极探讨相关专业废止或将其转向社会需求更高的领域。”

在此背景下,日本正在改变国立大学的同一化发展方向,即全部指向“小型东京大学”的单一模式,开始转向不同层次、不同领域、不同功能的个性化发展,即全球化、特色化、多样化的改革动向。

三种类型实现高校错位发展：世界卓越、特色优秀、地域贡献

根据《国立大学改革方案》,日本将实施三组类型的大学功能分类改革,分别是“世界一流水准的卓越教育研究”大学、有“特色专业领域的优秀教育研究”大学、主要致力于为“地域发展贡献”的大学。

根据三组功能分类的改革要求,东京大学、京都大学、名古屋大学、东京工业大学等16所大学为第一组,以打造世界一流大学水准的卓越教育研究为目标;筑波技术大学、东京医科齿科大学、东京外国语大学、东京学艺大学等15所大学为第二组,利用强势专业领域,创设富有特色的教育研究大学据点;剩下的55所大学为第三组,包括岩手大学、秋田大学、山形大学、横浜国立大学等,致力于为地域产业界培养人才,为地域发展贡献活力。

日本国立大学的这三种功能分类模式虽然在当地还存在一些争议与质疑,但由于日本文部科学省的强力推动,这项改革计划如今已经进入实施阶段。

目前,由于大学功能定位的分化,各大学内部组织已开始重建。从2016年起,已经有43所国立大学实施了院系重组,其中有26所大学将重组人文社会科学院系。

属于“世界一流卓越教育研究”类别的东京工业大学,已经开始实施整个学校的组织重组。学部与研究生院一体化,成立“学院”,目标是成为世界前10名的研究型大学。

属于“特色专业领域优秀教育”类别的东京海洋大学,因为水产和海事专业是其他大学没有的传统特色,而且“要应对第一产业(水产养殖业)的产业化要求和培养高素质船员的现代化需要”,2017年将新设海洋资源环境学部,全面打出培养海洋产业创新人才的大旗。

属于“地域发展贡献”类别的爱媛大学创设了社会共创学部,旨在培养地域发展引领型人才,活用爱媛丰富多样的地域资源,为增强地域发展活力作贡献。社会共创学部是一个文理融合型的学部,包括4个学科,在各个学科下,设置2至3个专业,例如海洋生产科学专业、事业创新专业、农业山林渔村管理专业等。所有专业都重视野外调查研究和现场作业,每个专业都安排有实地就业体验的学习。

改革动因：以美为鉴，强化大学类型结构

日本此番改革的动因何在?将会为日本高等教育带来哪些方面的变革呢?

首先,具有复杂的大学结构是构建一流大学体系的基本前提。有美国研究者发现,美国之所以拥有全世界最为发达的高等教育系统,就是因为其高等教育结构的复杂性。美国高等教育体系内各



类高校追求多元甚至截然不同的目标，拥有多元的赞助人和经费来源，治理机制也是千差万别。而这一复杂结构正是其活力与创新的源泉。

探寻美国高等教育多元化的原因，大体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市场和国家之间的张力，即市场和奉行不同的逻辑，因此，教育经费来源不同的大学从招生政策、学科设置到治理结构都会产生差异。二是因为美国高校体系事实上一直是个“大熔炉”：由本科学院（平民主义）、研究生院（精英主义）和赠地学院（实用主义）构成，实行截然不同的办学模式。三是，在高校治理权的分配上，也存在尊重传统权威、尊重理性和科学、推崇领袖个人魅力等各种理念。如此一来，就使得美国高等教育的结构变得极其复杂，在适应时代发展和多元化需求时显示出其灵活性和优越性。

有鉴于此，日本国立大学本次分类改革的最终目标也是希望通过政府的行政干预，打造复杂的日本高等教育结构，不同类型的大学根据各自定位，制定不同的办学目标，采取不同的治理模式，培养不同规格的人才，以不同的方式为社会服务。改变以往单一化的功能定位，以美为鉴，强化高等教育多元化。

其次，淡化大学层次结构，强化类型结构，是构建良好高等教育生态的基本前提。国际高等教育界普遍认可的一个理念是，大学不应有水平或层次上的高低贵贱之分，也就是说各类大学拥有平等的社会地位和公平的发展机会。不过，否定大学的层次结构并非要求各所大学遵循千篇一律的发展模式，而是要求各类大学根据自身情况和发展定位形成不同的类型结构。

日本国立大学功能分类改革就体现了这一基本精神，将 86 所国立大学分为三种类型，并且根据各类大学的表现平等地给予相应的补助。这样一来，各种类型的大学都能得到发展的机会，只要在特定的优势领域作出实绩，为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作出贡献，就都能得到社会的认可，获得相应的支持。

日本此次的国立大学分类管理改革，是日本高等教育界基于高等教育普及化、高校发展单一化等背景所采取的应对之策，是一场由上至下的覆盖面极广的高校定位变革。各项改革举措在各大高校内部正在逐步开展，对教育界和社会经济发展将会带来怎样的变化，值得我们持续关注。

（作者：程亚静 来源：《光明日报》，2016 年 11 月 6 日）

“工科教育计划”能否提升韩国高等教育

据韩国教育部近日报道，韩国将实施一项名为“工科教育计划”（Program for Industrial needs-Matched Education, PRIME）的政府补贴计划，旨在调整韩国高等教育学科专业结构，扩大工科专业的招生名额，减少人文、社会科学和艺术专业的招生名额，以解决当前韩国高校毕业生与就业市场供需结构比例失衡的问题。据悉，韩国将有 21 所高校从中受益，连续 3 年获得约 2000 亿韩元（约合 18 亿美元）的政府补贴，这也是韩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政府补贴项目。

根据 2014 年韩国教育部的调查报告，预计未来 10 年间，韩国将有 26 万个工科专业相关的就



业岗位空缺，同时有 53 万个文科、社科和艺术专业毕业生盈余。目前韩国 15 岁至 29 岁之间的青年失业率为 12.5%，是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最高点。因此，“工科教育计划”的快速推进，将缩小高校毕业生与职业岗位技能需求之间的差距，降低青年失业率。

然而，“工科教育计划”公布之后，韩国学生将面临新的挑战，因为高中生在学术发展方向的选择上就要开始转变，从人文、社科和艺术专业转向工科专业。同时，这项计划也使得韩国学生去国外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的人数激增。一方面，目前正在攻读文科、社科学位的韩国大学生可能会出国深造；另一方面，韩国国内工科专业学生数量的上升，使得他们需要在国外接受进一步的教育。

韩国高等教育经历了巨大的扩张，从 20 世纪 70 年代的 20 万名大学生到目前的 370 万名大学生。近年来，韩国政府一直在大力投资高等教育，通过实施“世界一流大学”计划和在仁川经济自由区主办外国大学分校，促使高等教育国际化，将韩国高等教育的质量提升到更具竞争力的水平。

然而，对于“工科教育计划”，批评者却认为，从全球教育的视角看，将大学的教学重点转向“职前岗位培训”，会降低韩国高校的学术竞争力，因为这项计划短期内可能会成功解决韩国青年失业和劳动力问题，但从长期来看，该计划潜在的危机可能是降低高校人文教育的质量和整个高等教育的价值。一旦韩国经济复苏，申请文科教育的人数会增加，韩国高等教育机构将不能满足需求。

(作者：张飞彦 来源：《中国教育报》，2016 年 9 月 30 日)

美国：“微硕士”项目呈发展趋势

随着“微课程”(micro-masters)在线平台的迅速发展，美国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尝试提供在线学位项目。麻省理工学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MIT)最先在供应链管理学科领域启动了该项目，申请者只需修完 5 门在线课程，并交付 1000 美元作为证书和考试费用即可获得学位证书。通过“微硕士”项目所获得的学分也可转换为麻省理工学院传统硕士学位的学分。大规模在线平台(edX)负责人阿南特·阿加瓦尔(Anant Agarwal)表示，MIT 每年提供 40 个供应链管理硕士学位名额，2015 年共有 3500 人报名参加“微硕士”学位课程。

此外，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也提供人工智能方面的“微证书”课程，密西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在经验研究设计、教育创新与发展、社会工作(实践、政策和研究)等领域开设了“微硕士”学位相关课程。超过 12 所高校计划实行“微硕士”在线学位项目，部分课程材料将来自传统硕士学位的课程。申请者不需要通过入学流程，仅需要修完一系列短期在线课程就可以完成学业。

阿加瓦尔指出，随着“微硕士”在线学位项目的发展，更多的学院将提供在线学位项目，这也为高校实施该项目带来一定的挑战，例如防治欺骗作弊问题。高校也将考虑通过更多的方式来权衡申请者的表现。

(翻译：胡子 来源：上海交通大学《国外研究生教育动态》电子版，2016 年 11 月)

